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2

复旦哲学评论

◎ 第二辑

◎ 上海辞书出版社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2*

复旦哲学评论

第二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哲学评论. 第2辑/林宏星, 林晖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5326 - 1883 - 8

I. 复... II. ①林... ②林... III. 哲学—文集 IV. B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503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装帧设计 杨钟玮

复旦哲学评论(第二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07 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6 - 1883 - 8/B · 63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6834427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雷泉 冯 平 孙承叔 刘放桐

吴晓明 余源培 张庆熊 张汝伦

陈学明 俞吾金 黄颂杰

本辑执行主编 林宏星 林 晖

编 前 语

近 10 年来,国内出现了不少学术丛刊。有的上承古贤坠绪,有的旁通西学新说。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诸多出版物相比,这些学术丛刊颇多自矜家法、各守门派,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整全问题的宏大议论,而代之以关于片段、局部的详细研究。作为一个象征,曾经显赫一时的学科之王——哲学,逐渐被诸社会科学夺去了领地乃至尊严。然而事有轻重缓急,学有本末源流。天下之事,论其重要,不过政纲教组;天下之学,究其本源,无非义理名相。学问不立则事功难成,义理不兴则政教失序。无论学问事功,推究其本源,总揽其全局,当在哲学。无论汉唐罗马,一个伟大时代的兴起,都有伟大的哲学为其精神准备。因念及此,爰有创办哲学评论之举。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第一高峰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学不出于王官,而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在这个意义上恐怕不能说什么周文疲敝。同样,当今各地学刊的兴起无疑也是中国文化的盛事。而江左之地,唐宋以降,天下学衡文宗,泰半归之。当此天时地势,《复旦哲学评论》的推出,应该是适宜的吧。

子曰:文不在兹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论文

和解的代价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现代性话语的批判性解读 汪行福(1)

对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的再反思

——从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的角度 张双利(18)

《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中的伦理学问题 李明辉(35)

庄子与《庄子》内七篇关系新证

——从张岱年先生的有关研究说起 王 博(51)

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

——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 ... 吴 震(61)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存有论思想辨析 杨泽波(83)

重读圣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一个跨文化的视角 ... 赖品超(111)

莱布尼兹的语言哲学的基本构想 汪堂家(126)

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构成

——以康德的相关著作为核心梳理其伦理体系的构成

要件 邓安庆(145)

当代实用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陈亚军(168)

数学中的“无限”概念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转向 方 刚(182)

列奥·施特劳斯 张汝伦(208)

符号学与跨文化性 钱敏汝(233)

心的概念与形而上学

——罗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郝兆宽(261)

译文

美国大学与社会正义的希望

——罗蒂复旦演说 王新生译(279)

现代的终结? 罗伯特·施贝曼著 马 俊译 张庆熊校(294)

编后记 (309)

稿约 (310)

稿例 (311)

和解的代价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现代性话语的批判性解读

汪行福

【内容提要】“和解”概念对黑格尔具有核心意义。对他来说，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文化和社会分裂。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主体的理性和个人的自由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分裂的力量。如何消除现代性内在的文化和社会分裂，实现知识和政治的和解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动机。他的整个体系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现代性的批判和内在扬弃。但是，由于受制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和资产阶级政治偏见，黑格尔为医治现代性创伤所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他追求的绝对知识和国家并没有实现特殊文化价值合理性的和解和特殊的个人自由之间的和解，而是把自己作为绝对的主体凌驾于具体知识和自由的个人之上。笔者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不存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的终极基础。一切意义都是通过与传统和其他文化的解释学对话实现的，一切合理的政治意志的形成也只有通过人民广泛参与的非强制的民主交往实践才能形成。黑格尔在具体的文化解释实践和民主政治实践之外去寻找克服现代性困境的绝对和解力量，不仅理论上是不切实际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黑格尔方案的失败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我们重新反思理性和政治的现代性意义，深入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把黑格尔哲学视为现代性辩证哲学话语的源头。黑格尔明确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的分裂和不确定性,并把哲学的任务定义为经过辩证扬弃,实现现代性的普遍和解。正如 Fred Dalimary 所指出的,和解(reconciliation)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黑格尔视为一个追求和解的哲学家,“和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① 和解的命运不仅是我们的把握黑格尔哲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的关键,也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枢纽。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现代性辩证法的哲学家,但是,黑格尔提出的和解方案总体是失败的。通过绝对知识及其伦理政治化身的国家来扬弃现代性的矛盾本质上是虚假的和解。黑格尔哲学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并影响到后来的哲学家。当代哲学家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把和解的理想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赋予新的更切实可靠的基础。笔者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是敏锐深刻的,本文主要任务是重建这一对黑格尔现代性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虽然本人对哈氏自己提出的现代性和解方案并不完全赞同,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总体方向是错误的。黑格尔逝世后,西方哲学出现了“精神的反升华”运动,这一过程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开始的。Karl Lowith 形象地把青年黑格尔派的处境比喻为在惊涛骇浪中驾驭历史之舟,既置身于历史之中,受历史的指导,同时在遇到风暴时,又能驾驭自己的命运。这意味着以一种更谦和的形式把握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既不放弃现代性的理想,又不堕入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幻想,在历史之中而不是超越历史之外去寻找现代性和解的力量。所以,哈贝马斯说:“青年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的方案,他们想以另一种形式的启蒙辩证法来把握和批判自身内部已经分裂的现代性。”^② 由此,哈贝马斯提出的另一重要论断是,我们仍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同时代人,我们仍然面临着与他们同样的任务,即不放弃现代性

① Fred Dalimary, *Life-world, Modernity and Critique: Paths between Heidegger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Polity Press, 1991, p. 73.

②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43.

理想和理性信念的前提下,重新谱写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抓住了现代性的问题的核心,以此来重述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谱系,赋予近现代西方哲学以时代性和现实性。黑格尔的继承者已经分化为左右两派。右派继承的是黑格尔体系,并把这一体系理解为现代性和解的最终表达形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知识与信仰、个人与国家、科学与哲学的和解,现代性已经终结,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启蒙运动的批判冲动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冲动,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改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卢卡奇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等黑格尔左派则断然放弃黑格尔绝对和解的教条和终极和解的理念,相信现代性计划还未完成,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批判和革命来推动现代性自我激进化的任务。现代性的辩证法并未终结,它只能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实践的改造加以继续。今天这一任务对我们仍然具有挑战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从启蒙运动到今天,整个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无不与现代性问题有关,由于这个问题在根基上是通过哲学领悟来展开的,讨论黑格尔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思考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

在黑格尔看来,他所处的是新旧时代转型的过渡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的旧日的生活和观念决裂,正使旧的一切葬于过去,而着手自己的改造”。^③ 这一时代的标志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普遍的尊重。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承续过去的生活,挪用任何已有的规范。现代性自我意识的普遍和绝对的统治,从康德开始这一点已经升为哲学意识,“康德哲学的观点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认识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上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④ 这一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7页。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96页。

现代性的巨大功绩,表达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诞生等历史事件的精神意义。具体来说,宗教改革改变了人的信仰方式和权威的基础,“神圣的世界在主体性孤独的靈魂中被改造为由我们自己设定的东西”。^⑤《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肯定了人的权利和意志自由,一切政治权威最终只有通过理性的批判才有效准。现代科学以中立的观察者的态度对待自然界,认识者获得认识和驾驭外界事物的自由。现代道德是以个人的意志自由为基础,它一方面肯定了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裁决权,另一方面肯定了个人在普遍的法律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现代艺术把主体的内在性的自我表达视为艺术的合理要求,从而赋予个人以独特形式追求自我生活理想要求的合理性。凡此种种,无不视为自我意识的文化和社会表现。正是现代性的生活和文化中体现的个人自由使康德有可能从主体性原则出发去领悟现代性的精髓。哈贝马斯认为,“从历史地看,康德哲学标志着新的证明模式的诞生”。^⑥我们完全可以把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解为对现代性规范基础的先验证明。“康德关于形式分化的理性概念恰恰意味着现代性理论。现代性是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典型形式的实体理性,并相信程序合理性以及它能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的智慧 and 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观念的可信性为标志的。”^⑦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心智结构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统一的、实体性的理性向形式的、主观的和多元复合型的合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主体哲学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为自由和解放,它意味着个人具有一种反思的批判地对待外部世界、自我和社会的能力。

康德三大批判无疑是现代性话语的重要开端,也是对现代性规范理想的典型的哲学证明。现代性的理想已经蕴含在现代科学、现代人权和宪法国家理想以及浪漫主义艺术之中,并逐渐凝聚为哈贝马斯所说的三大原则: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三大批判表达了这三个原则之间独立而又并存的关系。但是,康德的现代性理论是非辩证的。这种非辩证性在于,

⑤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17.

⑥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p. 1.

⑦ J.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p. 4.

康德没有看到,从客观理性到主观理性、传统的社会秩序向现代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秩序转变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内在分裂,存在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因此,康德没有看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的和解的重要性,仍然停留在对现代性原则的非反思的认同之中。而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对现代性本身的非反思的态度已经成了问题。他面临着新的任务,不仅是对现代性规范的证明,而且诊断它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哈贝马斯说:“黑格尔可以把康德哲学理解为现代性标准(权威的)的自我解释,然而,他认为自己还看到这一时代的最高反思形式中所没有把握的东西:康德没有意识到理性的分化,文化内部形式上的分工和所有领域的裂痕是内在的分裂(diremptions),因而他忽视由主体性原则而来的分裂。”^⑧黑格尔完全同意康德把主体的自由视为现代性的标志。然而,对他来说,问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的自由、个人的解放等如何具有实体性,如何具有一种超越自身的力量,把相互分离的个人融合为一社会统一体,使相互孤立的主观意识如何凝聚为统一的社会意志,如何克服理性的自我分裂和知识的分化,实现精神在更高程度上的普遍和解。基于这种新的问题意识,黑格尔把哲学引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它的任务不再是对主体性的简单地肯定,而且要对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目的在于克服主观理性引起的知识领域的分裂和主观自由引起的社会的分裂,用阿多诺的话说,是在形而上学衰落的时刻拯救形而上学的和解的普遍愿望。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是矛盾的。康德把一切本质因素都归于自我意识,但这种意识只是有限的个人意识,这样他就把有限的东西当作绝对的东西,绝对变成了有限:“康德这种哲学使客观的独断的理智形而上学寿终正寝,但事实上只不过是把它转变一个主观的独断主义,这就是说,把它转移到包含着同样的有限的理智范畴的意识里面,而放弃了追求什么是自在自为的真理问题。”^⑨康德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要为人类知识提供一个先验的基础,这种知识论的现代性理论虽然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却没有拯救出形而上学的真理。形而上学并非理智上的简单谬论,它源于人类对世界

⑧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 4.

⑨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58页。

整体理解的渴望,简单地放弃形而上学,意味着放弃理性作为一切对立和矛盾的普遍和解力量这一哲学的最根本的冲动。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的权威表述,但不幸的是,康德没有看到建立在主观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和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同样意味着传统文化统一体的解体和社会伦理统一体的解体。“宗教的瓦解导致启蒙自身无法克服的信仰和知识的矛盾。”^⑩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意味着统一的文化传统分裂为互不相关的知识领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的专业化,意味着文化知识同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分裂,社会失去维系集体生活的精神纽带。现代性如果不能既克服传统的超主体的实体性理性,又能在主体理性基础上实现文化和解和社会和解,现代性将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一场灾难。正是黑格尔第一次使现代性本身成了一个问题,在他那里,现代性理论已经是一种启蒙辩证法,一种主体性哲学的自我批判理论。黑格尔是一切现代性辩证法的思想源头。

二

黑格尔的思想轨迹大致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客观宗教的批判,经过对康德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过程。黑格尔最先是用康德的自我意识批判实证的宗教信仰,再用主体间性的伦理精神批判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主义,最后走向以超主体的绝对精神克服启蒙精神和康德哲学。但是,随着他由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最终抛弃了启蒙精神的主体自由和理性反思原则,对现代性的辩证扬弃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意义。它意味着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不再具有超越经验生活以实现绝对和解的能力,同样,在后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也不能越过个人和政治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认可而自我合法化的能力。理性只能以更谦逊的形式体现在相互理解的交往实践中,体现在每一次追求正义和更高的平等的社会运动中,体现在科学与生活的交流和文化的解释实践中。现代性是一项崇高而又充满风险的事业,它需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目标、改变自己的策略。

^⑩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19.

黑格尔是一个追求和解的哲学家,他一生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内在分裂的和解。笔者认为,《精神现象学》构成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基本上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上,调和理性和宗教的相互对立,并试图以希腊城邦社会为规范理想重建伦理生活统一体。在此之后,他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开始在主观的自我意识之上树立一个超主体的绝对精神,一个绝对和解的基础。

在《民众宗教与基督教》中,黑格尔试图区分理性的主观宗教和外在必加的客观宗教。他认为民众宗教是理性和人的自发情感、理性内容与宗教形式的统一。主观宗教表现了人的活生生情感和自由意志,客观宗教是僵化的知识;主观宗教是自发的,客观宗教是外部强加的。主观宗教是民众的宗教,它以理性为基础,以自由为标志。“那创造和哺育伟大志操的民众宗教是同自由手携着手前进的。”^①他心目中的自由宗教的典范是希腊城邦社会,在那里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伦理生活是统一的。与此相反,中世纪的基督教是实证宗教,是外在必加的、僵化的、教条的,在这里“接受一种权威信仰(即实证信仰),必须丧失理性的自由、理性的独立为前提,而理性丧失自由和独立就不能对外在势力进行任何反抗”。^②显然,黑格尔早期思想与康德的《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和费希特的《试评一切天启》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站在主观理性的立场上,反对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以人的自由反对一切专制。

但是,黑格尔很快就意识到康德的哲学局限性。康德把理性作为知识的唯一合理的基础,没有意识到理性作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的力量。虽然主观意识和个人自由是现代性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仅靠它们无法提供人类精神的和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解。换言之,道德的自我立法不能取代伦理的社会融合,主观理性不能作为现代性大厦的基石。因此,从法兰克福时期开始,黑格尔既批判客观宗教也批判主观的理性。他认为,文明发展到今天,精神的冲突不再仅仅是理性与信仰的冲突,而是理性本身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道德与伦理的冲突。知识取代信仰固然是人类的进步,但是,如果理

①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页。

②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页。

性没有提供信仰曾经拥有的相互和解的力量,理性就没有战胜信仰。在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达到极致的启蒙精神不过是树立了一个新的偶像。它把知性和自我反思绝对化,错误地把知性和主观反思置于理性应该占据的位置。一旦知性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成为绝对和无限的东西,无限和绝对就沦为有限的、分离的、固定的东西,理性也就失去了在传统形而上学中保持的普遍和解的力量。因此,主体性哲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瓦解传统宗教和世界观的基础,给人带来自由;另一方面,又把入交给主观任性的意志。黑格尔试图从内部冲破主观唯心主义的主体哲学的束缚,使理性恢复其实在性和伦理性,成为现代性普遍和解的力量。黑格尔认为,现代性的症状是伦理生活的解体 and 精神的分裂。在新旧时代转型过程中,时代精神已经分裂了。传统派坚持原来的宗教和信仰,理性派相信理性道德和自我意识,它们都使行为规范脱离了伦理共同体活生生的理解过程,成为强制性的外在强加的东西,本质上是非自由的、实证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道德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抽象的理智同一性基础上的,这种道德同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它只停留在哲学家的自我意识之中。真正的道德不仅要与理性一致,而且应该同集体的需要和情感一致,不仅要成为自我意识,而且要融合到公共社会生活之中,成为社会成员相互交往的调节力量。把宗教和理性、信仰和知识抽象对立起来,只会加深时代精神的分裂。真正的宗教应该是道德的宗教,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宗教的道德。如果说道德代表理性和自我意识,宗教则代表公共性和伦理性,那么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形成一种以宗教为中介的道德,才能把理性渗透到整个民族的伦理生活总体之中,成为促进集体自由的力量。启蒙辩证法的任务是从内部揭示启蒙的片面性来克服启蒙的理性实证化的倾向。我们可以从黑格尔早期哲学中发现他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其核心是形式化的抽象道德与教条化的传统伦理之间的分裂。因此,他提出重建自由的伦理生活的任务,但是,黑格尔有限的生活经验和德国贫乏的生活并没有为他的和解理想提供任何具体的经验线索,结果他只能在某种理想化的前现代的生活范例中寻找其和解的形象。如他把希腊的城邦社会和耶稣及其信徒组成的小圈子作为这个理想的典范。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个幻想。黑格尔通过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开始意识到这一困难。在市场经济中,抽象的商品交换已经独立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成为抽象的普遍的交往中介,它撕开了传统生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投入到冷冰冰的商品交换关系之中。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黑格尔放弃了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传统伦理生活与现代道德结合起来的和解方案,转向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和解。

三

从耶拿时期开始,黑格尔转向客观唯心主义,通过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来扬弃主观主义文化和抽象主义道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重建理性普遍和解的基础,这就是他的绝对精神的概念。对黑格尔来说,“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其概念,并由此保障其稳定性”。^⑬ 这一新的基础就是《精神现象学》提出的绝对知识概念。正如马克思早就强调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的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相信,只能从绝对知识出发才有可能超越启蒙主体性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主观主义的道德,理性的宗教和资产阶级个人法权的社会。通过绝对知识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克服知识与生活的对立、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这一新的思路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看到康德和启蒙哲学对现代性的主观主义解释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在批判和扬弃中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绝对知识不过是绝对精神取代自我意识主体,哲学重新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为现代性树立了一个新偶像。

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是分裂时代的一种分裂的哲学意识。它把有限和无限、感性和理性、宗教和信仰置于虚假的对立之中。哲学应该重新审视理性,展示理性普遍和解的统一力量。传统形而上学把理性理解为实体,启蒙哲学则把理性理解为主体,理性应该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唯如此,才能既坚持现代性的反思原则,又不放弃理性的绝对性。黑格尔的基本思路是从康德的现代性的先验的知识论证转向对现代性的历史哲学证明。绝对精神是理性自我中介的运动,它经过意识的不同发展阶段,扬弃具体知识的有

^⑬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21.

限性,最后把一切知识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成为绝对知识。绝对知识是完满的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对立,使历史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特殊与普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达到和解。哈贝马斯对这一诉诸绝对知识重建理性统一性的观念作了概括:“如果真实的同一性通过反思哲学方式实现,理性就只能设想为主体同自身的关系。但是现在,反思不是作为主体性的绝对力量把自己强加在另一东西的头上,而是发现自己的存在和运动是在不断地摆脱反思带来的实证性中抵制一切绝对化。在抽象的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的位置上,黑格尔放上了主体的绝对的自我关系,这种主体从它自己的本质中获得自我意识,并把有限和无限的差异置于自身内部。”^⑭作为绝对主体的精神和理性并不先于世界,它本身就在世界之中构成世界的本质。精神通过不断扬弃自己的异在形式,回到纯粹的自我意识。到此为止,黑格尔克服了自己早期信仰的康德哲学,也超越了诉诸自己曾经信奉的民众宗教。但是,通过绝对知识实现理性的和解的方案,是以新的理论困境为代价取得的虚假的胜利:“黑格尔能够以理性来把握现代性。这样他树立了哲学作为统一的力量,克服来自反思本身的实证性——并由此治愈现代各种解体现象。然而这一体面的印象是虚假的。”^⑮

首先,黑格尔没有实现哲学和生活的统一。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主观主义哲学和文化的批判,克服其消极片面的形式,促进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而他的绝对精神是精神本身的自我运动,是绝对知识内部的自我中介,自我扬弃,并没有伦理生活的外在的社会形式。这一过程无需人民的参与,也无需人民的认可。把有限的知识扬弃在无限的绝对知识之中,最多只是相互分离的理性知识之间的和解,并不是理性与伦理的和解。“哲学的理性能实现的至多是部分的(partial)和解,因为它缺乏民众宗教那种使人民变得理性,使哲学具有感性化的外在形式,相反,人们发现自己甚至被自己的哲学牧师抛弃了。”^⑯

其次,绝对的运动是一个自我意识过程,绝对通过自身的运动在哲学中

⑭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33.

⑮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36.

⑯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36.